

● 向青著

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

序

DH92/32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

向 青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向青同志，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1984年7月至1985年2月，曾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被授予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职称。作者较长时期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发表过一系列这方面的论文和著作。本书是作者系统论述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历史关系的专著，作者以丰富的史料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1919年3月到1943年6月期间，共产国际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和支持，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功过，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评价。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

向青 编著

责任编辑：吴金泉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20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5,800册

统一书号：ISBN7-301-00304-8/D-005

定价：2.94元

前　　言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历史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加以研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就是在研究这一历史过程中，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原则的运用，充分注意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对这一历史关系的发展曾经作过的论述。例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世界革命的红色大旗是第三国际高举着；他讲过共产国际对中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的帮助和共产国际与日益成长着的各国党之间的矛盾；他还讲过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此外，他还对共产国际作过“两头好，中间差”的评价。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曾经对此作过许多论述。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着重地阐述共产国际这一历史上的政治组织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作用，它不可能象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那样全面地阐述各种历史条件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但是，这不等于说只有共产国际这个政治组织才对中国革命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其他社会历史条件都是无足轻重的。同样，本书对共产国际也主要阐述同中国革命有关系的内容，它不可能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那样去全面地阐述共产国际同世界各国革命的关系，但这也不等于说共产国际只对中国革命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而对其他各国革命是无关紧要的。

为了便于阐述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至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关系，谨将这一历史关系

分为十三章，分别加以阐述。其中一至三章所阐述的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四至七章所阐述的为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八至十一章所阐述的为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十二、十三章所阐述的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由于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联共（布）和中国革命继续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一联系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继续，所以，本书在全书十三章之后，附录了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联共（布）和中国革命的论述。就使得本书在反映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方面更为充分和完整。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因此，本书的撰写是建立在作者所发表的有关论文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也注意吸收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作者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一书是力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阐述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本书可供从事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的研究的同志参考，也可作为高等学校的专题课的教材。

作者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共产国际成立。中国先进分子赞助俄国 革命、走俄国革命道路	(1)
第二章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3)
第三章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和国共合作方针的制定	(27)
第四章	共产国际组织联系的加强和 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	(45)
第五章	共产国际声援五卅运动和 推广国共合作的战略	(62)
第六章	共产国际同“中山舰事件”的处理和 中国土地政策的制定	(76)
第七章	共产国际挽救中国革命时局的指示和 中国大革命失败	(99)
第八章	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和 中共“六大”的召开	(116)
第九章	共产国际政治上的“左”倾及其对 中共指导机关的严重影响	(138)
第十章	共产国际支持王明“左”倾错误和 中共召开遵义会议	(162)
第十一章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87)

第十二章	共产国际支持中国抗战和中共坚持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219)
第十三章	中共为实现毛泽东思想统一而斗争和 共产国际主席团宣告共产国际解散	(237)
结 束 语	(253)
附 录	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联共（布） 和中国革命	(261)

第一章

共产国际成立。中国先进分子赞助 俄国革命、走俄国革命道路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俄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从而为在俄国建立第三国际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共产国际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由于十四国武装干涉正在进行，中俄交通处于隔绝的情况之下。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寻求同俄国革命建立联系。中国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尤其是苏俄红军进军西伯利亚，使得中俄两国革命更加接近，最后终于打开了中俄交通，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建立了联系。

一 中俄交通隔绝和共产国际建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泛指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的历史情况，并不是十月革命以后，立即就有俄国革命者来到中国，把马列著作交到中国先进分子手中；十月革命后，也没有中国先进分子立即同俄国革命建立联系。十月革命前，中国已有孙中山同盟会中的革命者、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中国社会党人在小范围内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留学生也从国外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所有这些，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直接影响，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因为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一度参加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他们千方百计地防止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曾经很快地出现在东方。1917年12月，守卫中东路的俄国军队中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驱除了沙俄派驻中东路的督办霍伐斯。^①但张作霖部下、黑龙江省督军鲍贵卿很快就镇压了这一革命。1918年1月，中国北京政府下令封闭了中俄国境，关闭了中俄交通。1918年1月14日，中国北京政府连续向吉林、黑龙江省发出命令，要求派军队封锁满洲里、瑷珲、绥芬河、东宁、虎林、图门江等地。^②

虽然十月革命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但中国先进分子仅只从资产阶级通讯社那里了解到一些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这样，在中俄交通关闭的条件下，为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这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从1917年10月革命时开始，一直持续到1930年3月中国和苏维埃俄国交通之打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建立。

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之所以能够关闭住中俄交通，隔绝布尔什维克同革命中国的联系，这主要是由于西伯利亚政治形势决定的。1918年，沙俄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哥萨克人谢美诺夫、中东路督办霍伐斯等三股白匪蜂起。5月，捷克人（奥军俘虏）四、五万人站在白匪一边。接着日、美、英、法、中（北洋军阀政府）

① 见上海《时事新报》1917年12月5日，第二张，关于“哈尔滨近闻种种”的报道。参看埃德蒙·克拉布所著《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书中的“中国和西伯利亚干涉”的部分。

②中国北京政府档案载1918年1月14日电令：“吉林孟督军、郭省长，黑龙江鲍督军……军队在满洲里、瑷珲、绥芬河、哈尔滨、三姓、拉哈苏苏等处严密稽查。”中国北京政府档案载同日电令：“奉天张督军、吉林孟督军……酌派劲旅分驻图门江、东宁县、虎林、绥芬河四处，以资保护。”

五国出兵干涉西伯利亚，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主要是进占中东路和封锁中俄国境。1918年8月24日，中国北京政府段祺瑞等联合签名发表了《海参崴出兵宣言》，加入了十四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宣言说：“民国政府……受本合众国政府之创议，特派相当军队，出兵崴埠，与联合各国取一致之行动。”中国北京政府派出的干涉军为宋焕章支队，只有一个团的兵力，“七年（1918年）8月拔队出国。”^①11月18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高尔察克夺取了鄂木斯克的政权，成为西伯利亚白色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因此，这一时期西伯利亚地区的革命运动曾经遭受了挫折。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第三国际的准备工作，在俄国开始了。早在1914年，列宁就认为第二国际已经死去，应当建立新的国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12月，列宁会见德国共产党代表以后，写信给齐切林（Chicherin, Vasilevich）决定要为建立第三国际而努力。于是1919年1月24日发出了邀请书。邀请书说：“签署此邀请书的各党派和组织认为，召开新的革命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实属必要。在战争和革命期间终于看清，不仅旧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二国际已经彻底破产，不仅旧的社会民主党的骑墙派（所谓“中派”）已经不能进行积极的革命行动，而且真正革命的国际目前已经十分清晰地展现出轮廓。”邀请书说：“我们必须出面倡议，把讨论召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国际代表大会问题提到日程上来。”^②3月2日至6日举行了大会。在列宁的亲自参加下，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创立了第三国际（共

^① 见中国北京政府档案《海参崴出兵宣言》；又见中国北京政府档案载1923年1月21日代理驻崴支队长杨典钦报告称：宋焕章“为驻崴支队长，率之以往，七年八月拔队出国。”

^②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载《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出版，第4页。

产国际)。^①但是，会议对是否立即成立第三国际，曾经发生了争论。因为德国共产党代表埃伯莱恩认为，新国际一定要创立，但现在时机不成熟。而奥地利共产党、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匈牙利共产党等要求成立新的国际。这时，奥地利代表斯廷哈特经过十七天的艰难行程到达会场，他主张立即成立共产国际，他的充满激情的发言，给大会以很大的影响。会议表决结果，除德共代表弃权外，有三十二个党和团体表示赞成成立共产国际。于是，共产国际成立。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正处于高潮时期，苏维埃俄国同中欧、东欧无产阶级革命是相互支持的，匈牙利的革命形势给大会以极大的鼓舞。共产国际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的七名委员都是欧洲各国的代表。共产国际主席为季诺维也夫，书记为巴拉巴诺娃、沃罗夫斯基，都是俄国人。^②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无论是从内容到组织都注重于欧洲革命，这是当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当时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范围所决定的。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绝无可能接纳来自中国代表的情况下，邀请了中国华侨工会负责人刘绍周、张永奎出席了会议。中国华侨工会原名“中国华侨旅俄联合会”(Союз Кита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В России)因成员多数为工人，所以1918年底改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Союз Китайских Рабочих В России)。刘绍周、张永奎是中国华侨工会负责人，但中国华侨工会是群众团体，而不是党政组织，刘绍周、张永奎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

^① 关于列宁创建共产国际，可参看布兰科·拉兹齐和米洛拉德·德拉克维奇合编的《共产国际传记词典》，斯坦弗胡佛研究所，第218~220页，列宁传记。

^② 关于共产国际的创建，可参看《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及珍妮·德格拉斯选编的《共产国际文件》（1919—1943）第一卷（1919—1922），第1—5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资料室编印。同时参看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出版，第13—132页。

义出席会议的。

1919年2月，刘绍周、张永奎接受了苏俄外交部的约请，出席了会议。1919年3月4日，在共产国际“一大”第三次会议对是否同意建立第三国际问题进行表决时，刘绍周代表“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三十一个发言，表示“同意”建立共产国际。^①刘绍周还在会上作了专门发言。他的发言先用汉语，后用俄语，会上未作出记录。会议记录注释说：“在代表大会发言记录中，中国代表刘绍周的发言没有记上。但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真理报》上有他的祝贺词，他的祝贺词还刊登在《代表大会资料》上。”刘绍周在贺词中说：“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仅代表成千上万散居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后来，刘绍周回忆说：“我在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除代表中国工人对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外，还谈了一下关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②列宁在会议进行期间亲切地接见了刘绍周、张永奎。^③

二 中国先进分子寻求同俄国革命建立联系

十月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是向西方学习的。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转而向俄国学习，寻求同俄国革命建立联系。

李大钊是一位十分重视俄国革命动向和极其赞助俄国革命的

^① 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党的出版社，1933年版，第131页。

^② 见刘泽荣（绍周）：《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文史资料选辑》第60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③ 见刘泽荣（绍周）：《回忆同伟大列宁的会晤》，载《工人日报》1960年4月21日。

革命者。早在1917年四、五月，他就著文歌颂二月革命中的社会民主工党。说：“俄京骚动之际，其各大都会，赤旗飘扬。一挥而蔽罗马诺夫朝之日月，而СДРП（即社会民主工党）之帜，到处与国民以绝明之痕印”。^①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指出：“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要“翘首以迎世界文明之曙光。”^②1919年2月，李大钊又说：“由乌拉尔山至阿尔布士山。其间的城市，大半成了社会主义根据。……但是这种革命，决不止于中欧一隅，……我们中国也许从西北陆地，东南的海岸，望见他的颜色。”^③在中国，只有李大钊最早关心共产国际的建立问题。1919年1月下旬，外电报道了共产国际即将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④李大钊热情欢迎这一国际组织的成立。他于1919年2月著文说：“为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又说：“中欧的社会革命一经发动，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⑤据苏联学者认为：1919年夏天，李大钊得以会见了苏俄友人伯特曼，伯特曼后来成了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远东人民处处长。在这次会见中，伯特曼使李大钊了解了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此时正在他的著作中尖锐地批评帝国主义。^⑥尽管李大钊十分关心俄国革命，并探索使中国革命同俄国革命相联系，但在中俄交通隔绝的情况下，共

① 见《甲寅》日刊1917年4月24日、25日、5月2日、5日。

② 见《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1～105页。

③ 《战后之世界潮流》，《李大钊选集》，第137页。

④ 1919年1月25日苏里克电：“莫斯科国际共产党大会议决召集新国际革命党大会，并拟定计划，盖合德国斯巴达克斯国与俄国过激党之成员而成为者……”见上海《时事新报》1919年2月6日。

⑤ 《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李大钊选集》，第134页。

⑥ 克里夫佐夫和克拉诺娃：《李大钊——中国第一个马列主义宣传家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载苏联《远东事务》（Far Eastern Affairs）1977年第3期。

产阶级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是十分困难的。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他所经历的挫折和失败，使他赞助俄国革命。十月革命前，孙中山就对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有某些了解。如孙中山说：“尝考欧西最初社会主义之学说，即为‘均产派’，主张合贫富各有之资财而均分之。贫富激战之风潮既烈，政府取缔之手续亦严；政府取缔之手续既严，党人反抗之主张益厉。”又说：“厥后有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①后来，列宁和孙中山之间又有所了解。例如，1912年4月，孙中山发表了《解临时总统职后在同盟会会员饯别会演说词》，孙中山说：“现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美更为富足，比法兰西更为文明的了。……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1912年7月11日比利时《人民报》(Le Peuple)以《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为题发表了译文，接着俄国布尔塞维克机关报《涅瓦明星》第17期加以转载，同时发表了列宁的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②1912年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一篇论文（我们是从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上转载来的）使我们俄国人非常感兴趣。”列宁说：“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孙中山的论文正

①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506页。

② 1956年11月11日发表了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说明了此文与列宁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关系。1981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谢刚文章《关于孙中山一篇文章的出处》，介绍了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的出处及与列宁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关系。

是这样的纲领),迫使我们(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机会)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说:“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人民的真正伟大思想”。^①十月革命以后,中国最早报道这一革命的是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11月10日,《民国日报》大号标题是:“美克齐美(Maximalist之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为了同列宁建立联系,1918年孙中山在上海设法通过许多中间媒介送给列宁一封信,说国民党对于你们国家革命党所经历的艰苦斗争表示高度的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在一起,并将领导共同的斗争。祝贺他的成功和支持他继续进行斗争。列宁收到信后,非常感动,他把这封信看做是“东方的曙光”,^②为了回答孙中山的来信,1918年8月1日齐契林写信给孙中山,信中说:“苏俄人民委员会给我以光荣任务,感谢您尊敬的导师,在几个月以前,代表中国南方政府给工农政府的祝贺词。”“帝国主义政府、资产阶级爪牙的军队铁环般的包围……把我们同中国南方的友谊截断了。”“这个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向往着中国兄弟和期望同他们共同斗争。”^③信中还说:“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④但这封信没有送到孙中山手中。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7月第2版,第424页。

② 见梁绍全(译音)和诺曼·帕尔默所著:《孙中山和共产主义》一书的第53~54页。

③ 引文见叶菲莫夫:《孙中山——寻找道路1914~1922》,苏联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 引自珍妮·德格拉斯选编《苏联外交政策文件1917~1924》,1951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

三 五四爱国运动和苏俄红军进军西伯利亚

五四爱国运动对于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接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还没有提出支持俄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西伯利亚的口号，但这一运动确实打击了一切干涉西伯利亚的帝国主义者。因为五四爱国运动是由于反对“五强”（英、美、法、意、日）操纵下的巴黎和会而爆发的。他们的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表明中国先进分子完全抛弃了对西方列强的幻想。当时由陈独秀所撰写并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随感录》说：“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还说，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①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列宁和共产国际正在集中精力于领导欧洲革命，从而使欧洲革命同俄国革命结合在一起。当时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指出：“国际能够使所谓一国的利益服从国际革命的利益，从而实现各国无产阶级的互相帮助，因为没有经济方面及其他方面的相互支援，无产阶级是不能建成新社会的。”^②五四爱国运动，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东方革命的关心。五四爱国运动对于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的联系，有着直接的影响。后来，共产国际所以派使者来中国找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就是因为共产国际“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

① 见《每周评论》第20期《随感录》（陈独秀）。

② 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2月版，第101页。

市的大革命运动”，^①从而才有派人“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的决策。^②

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进军，对于打开中俄交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苏俄红军在鄂木斯克同高尔察克打了一个扭转西伯利亚军事形势的战役，摧毁了高尔察克的统治中心，高尔察克仓皇逃至伊尔库茨克。1919年5月29日，列宁《给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表明列宁对收复乌拉尔地区抱有很大的决心，同时也说明苏俄政治形势还相当严重。列宁说：“如果我们在冬季以前不能收复乌拉尔，我认为革命的灭亡就不可避免了。要全力以赴。”^③事实证明，列宁的决心取得了成功。1919年六、七月，苏俄红军收复了乌拉尔中心地带，向东进发，8月进抵托博尔河。苏俄红军得到了高尔察克后方声势浩大的游击运动的支持，从而越战越强。1919年秋天托博尔河大激战，高尔察克军队被击溃，11月24日苏俄红军攻克高尔察克的“首都”鄂木斯克。这一战役之后，苏俄红军更加接近于中国边境地域。在此期间，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加拉罕（Karakhan, Lev.）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指出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向东进发”，其目的不但要“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帮助中国人民”，宣言说：“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力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伐斯、谢美诺夫和俄国军队、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

① 引自李达《七一回忆》，载《七一》创刊号，1958年7月1日出版。

② 引自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载《新观察》1957年第13期，7月1日出版。

③ 列宁：《给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1页。